

1962年边界战争及其对中印关系的影响

王宏伟

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已过去40个年头。尽管今天中印关系已大有改善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但是那场短暂的战争所产生的误解依然存在,其阴影仍在无形中影响着中印关系的深入发展。

中印两国有着几千年的友好交往的历史和相互学习的优良传统,两国在近代都遭受过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侵略、压迫和剥削,在它们于20世纪40年代末期分别获得独立和解放后,本应平等相待,相互学习,互相支持和密切友好合作,以更好地发展和建设各自的国家,使饱受苦难的中印两国人民得以早日享受幸福美好的生活。但是,令人们遗憾的是,由于某些领导人的错误观念和不当政策,中印关系走了一条曲折发展的道路。

战争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1962年的边界战争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世界各国,包括印度在内的许多国家有见识的学者,诸如印度学者卡鲁纳格尔·古普塔、英国学者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和和美国学者史蒂文·霍夫曼等,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论述,没有必要在这里在多费笔墨。我只想指出的是,昔日的尼赫鲁政府不仅完全继承了英帝国的安全战略思想,多次干涉中国西藏的内政,而且在边界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比英国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英国人虽然划了一条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但他们从来不敢实际占领位于该线以南的由中国西藏地方政府长期管辖的中国领土(后来还认真考虑过要在色拉山脉划一条边界线),但是尼赫鲁政府却那样做了。有证据表明,尼赫鲁在印度独立后不久,即在给印度情报局负责人穆立克的指示中说,要将中国看作敌人^①。正是在他的批准下,印度政府于1948年派出边境武装警察强行驱赶中国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占领了色拉,接着又于1952年进一步用武力强行占领了达旺等地。

但是,尼赫鲁并没有就此止步。他要根据自己的意志来划定整个中印边界。他一再毫无根据地强调,中印边界是“确定的、最后决定了的”,并且是“不容进行任何谈判的”。1960年4月,周恩来风尘仆仆地专程前往新德里,力图与尼赫鲁政府公平友好地解决边界问题,但是遭到尼赫鲁的拒绝。接着,尼赫鲁于1961年下令实施“前进政策”。印军正是根据这一政策在中印边境全线向中国境内推进,不断袭击中国哨所,打死中方边防人员,严重威胁和破坏了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到了1962年10月12日,尼赫鲁居然公开声称,他已下达印军把中国人从东北边境特区赶出去的命令(实际上是将他们位于“麦克马洪线”以北的自己的领土上赶出去)。这一举动震惊了世界,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在第二天即发表了《尼赫鲁对中国宣战》的社论。

^① N. Maxwell "Sino-Indian Border Dispute Reconsidered,"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Apr. 10, 1999, p. 909.

每个客观和持公正立场的人都可看出,1962年战争是尼赫鲁政府强加给中国的。中国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进行的反击和后发制人的行动,一是为了捍卫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二是希望将尼赫鲁政府拉回到谈判桌上来。中国并不想通过武力来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但他们很快主动地撤回到原来的阵地,即有力地证明了这点。

但是,尼赫鲁政府是如何向印度公众说明和交代这一事件呢?它没有坦然承认自己的错误,将真相告诉印度公众和人民,而是选择了将错误栽在中国头上的不诚实做法。它谴责中国向印度“发动了无端的侵略”,中国“背叛了印度”并“在朋友背后捅了一刀”,等等。这种颠倒黑白和“为争取同情而玩弄的冷酷政治花招”^①产生了两方面的有害后果:一、作为兄弟的中国形象从此在印度公众中成了“魔鬼”;二、印度大规模地扩军备战,导致了中印两国此后的长期对抗,造成了双方在人力和物力方面难以估量的损失。这的确令所有热心维护中印友谊的人们感到十分痛心。

认真总结 1962年的经验和教训

尽管如此,我们也没有理由垂头丧气。古语云,“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如果后继者能从前人的错误中吸取正确的经验和教训,并将它们转化为持久的行动,那将无异于中印两国人民拥有了一笔无价的宝贵财富。

应当吸取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呢?在这个问题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觉得主要有三点:

一、严格遵守双方早在1954年即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历史证明,要使每个国家都认真做到这点并非易事。这里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搞霸权主义的国家明知故犯的行为,另一种是新兴国家由于受外界影响或缺乏经验,在实践中往往发生事与愿违的现象。1962年战争看来是属于后一种情况。这段曲折历史说明,对一个刚从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的国家来说,首先存在着一个要在思想和意识形态上肃清流毒和与曾经侵略并对其进行过长期殖民统治的帝国主义在思想上划清界线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便极易在处理与周邻友好国家的关系中发生问题。就印度的情况说,正如印度著名学者吉里·德辛卡尔所指出的,“如果印度的新统治者——印度国大党领导人对印度共和国这个新国家的国家利益和防御有一个独立的、坚定的思想的话,印中关系后来的历史也许会另外一种是情景。”^②

二、正确处理边界问题和领土争端

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在许多亚非国家间都存在着边界和领土争端。有关国家能否正确对待和妥当处理这些争端,的确事关重大。它不仅会影响双边关系的正常发展,而且也会影响整个地区和平与安全。在处理边界问题时,坚持通过和平谈判,使问题逐步得到对双方来说都是比较公平和合理的解决,而不能企图通过武力和武力威胁来解决。在这里,重要的是要有长远眼光,不要利用一时在表面上看来有利的形势,企图以武力或武力威胁来压服对方。这样做往往会把事情弄糟,出现事与愿违的后果。

三、一时解决不了的分歧,可以搁置,不使它妨碍或影响双方正常关系的发展。

这几条经验可能不全面,在提法上也可能不尽妥当,可是其含义是清楚的。我觉得,在

① 印度学者艾耶尔(R. C. Ayer)语,见“*The Sino-Indian Dispute*,”*Frontier*, Calcutta, Nov. 21, 1970.

② Gini Deshingkar “*The Prospects For India- China Relations*,” 1992年9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讲演稿。

1962年,中印双方哪怕只要坚持其中任何一条都可以避免战争;今后双方只要坚持这几条,也肯定能保证中印之间永远不会因为边界问题再次爆发战争

为深化中印关系创造必要的条件

1988年拉·甘地总理对中国进行历史性访问后,中印关系逐渐恢复正常。1993年拉奥总理访华时,双方签订了《关于在中印边界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1996年江泽民主席访印时,双方进一步签订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这几次高层访问和两个协定的签订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们表明中印两国的领导人认真吸取了过去的经验,变得更加明智和具有眼光,而中印两国的关系也趋于成熟。这也就是为什么近 10多年来中印关系尽管有时出现波折,但从总的来看,发展是比较顺利和迅速的原因。

但是,我们不应自满,应当看到,从中印两国的人口、幅员和经济规模以及在当今世界上所起的作用来说,双方之间的合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广度和深度。我们应当进一步做出努力,发展和深化中印关系,以便能为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世界和平做出更大贡献。

那么,是什么阻碍着中印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和双方合作中巨大潜力的发挥呢?这里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从当前实际情况看,主观因素似乎处于主导地位,而且阻力主要来自印方。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尽管由于有印度政府领导人的默许和支持,在印度媒体和各方面有识之士的努力下,目前印度的政治、社会和公众舆论方面出现了一些可喜的变化,已有不少人开始对 1962年战争的真相有所了解,对中国的看法有了一定改变,但是应当看到,尚有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一些有影响的政府官员、军方和智库阶层中的人士,还没有摆脱,或者没有完全摆脱 1962年战争的阴影。这些人有的虽然目前不再公开叫嚷,但在内心深处仍坚持着尼赫鲁时代的观点和看法,视中国为威胁或未来潜在的对手;在他们的思想和意识中,英帝国主义的遗产和影响依然存在,有的人还不时为印度失去西藏这个缓冲区而长吁短叹;他们有意回避 1962年战争的真正原因,对其做出牵强附会和千奇百怪的解释;有的甚至不承认基本事实,否认尼赫鲁曾向印军下达过进攻中国的命令。有的鹰派人物,也试图对 1962年战争进行总结,但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回答是“印度作为一个拥有独立核武器的军事强国的兴起,是所获得教训的结果”。^①这种对印度当前现状的片面而缺乏理性的解释(也是其总结 1962年战争教训的结论),的确令人吃惊。其实,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早在独立初期即表示要得到核武器,并不是在 1962年后才有这种想法。平心而论,印度希望成为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拥有核武器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根据鹰派的心态和逻辑,他们似乎在为尼赫鲁政府惋惜:如果有军事实力,本可以成功地用武力将其意志强加给中国的。我不相信,有理智和爱好和平的印度人民会接受或认同他所作结论中暗含的这种逻辑,因为其中蕴藏着危险的因素。

由于受到昔日尼赫鲁政府的误导,人们在不了解 1962年战争的真相的情况下,自然对中国疑虑重重,总是带着有色眼镜观察中国的一举一动。例如,中国与其它南亚国家发展正常的关系,他们便觉得中国在包围和威胁印度;中国提倡开展对各方都有利的区域合作,他们担心

(下转第 13页)

^① Brahma Chellaney, "The Lessons From A War," *Sunday Hindustan Times*, October 20, 2002

合美国。虽然,目前印度的主流观点仍然是要保持国家决策的独立性,但不能否认的是,在一些安全问题专家中,与美国搞某种形式的同盟关系的观点颇有一些市场。不管美印关系会走多远,我们的战略家们都应该意识到形势的发展对中国的影响并寻求适当、适时的对策,应该超越睦邻的概念,用战略的眼光看待印度。第三,近年来,印度将战略视线扩展到南亚之外。它的“向东看”战略,与日本等国的合作,加强海军军事部署及与台湾接触等动作都值得关注。与之相联系,印度对华战略的着眼点也在试图超越边界和西藏问题,把目光放在更广的范围内。这里并不是在宣传“印度威胁论”,因为笔者并不认为印度的一些动作的意图完全是针对中国的。

从印度的角度讲,40年前发生的中印边界冲突使一些印度人看中国时多了一份感情色彩,进而对中国持疑虑和不信任的态度。这也妨碍了印度人客观、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印度一些人也加入到宣扬“中国威胁论”的队伍中来。其间,印度领导人在1998年核试验前后不时流露出的“中国威胁论”与近年来中印关系显著改善的积极势头是不相称的,也不能反映印度许多防务人士的真正想法。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招来中国人对印度动机的怀疑。

综上所述,中印双方只有客观、现实地看待、判断对方,才能制定正确的政策,中印关系也才能得到稳定和健康的发展。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上接第 5页)

会影响印度的安全,表现十分迟疑,等等。试想,在这样一种心态和气氛下,怎么能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中印关系呢?我并不抱怨这些人,因为他们的大多数也是受害者。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们会认识到中国是印度真正的兄弟和朋友。这一天到来得越早,对中印两国越好。

40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虽然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它对中印这两个亟需改变其一穷二白面貌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确实太长了。印度有眼光的政治家和精英阶层中的有识之士,需要设法尽快使那些仍在1962年战争阴影下生活的人从中走出来:除正确引导公众舆论外,似乎应以超常的魄力和勇气采取一些特别措施,如公布《亨德森·布鲁克斯报告》(The Henderson Brooks Report)等,使他们的思想得以解放,能正确地看待和理智地对待中国。

中印之间的误解和疑虑彻底消除之日,便是中印合作空前全面深化之时。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